

## 文溯阁与《四库全书》

王清原

位于东北沈阳的故宫，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（1625）。其时，努尔哈赤力排众议，果断决定由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，营建宫室，使沈阳成为东北政治、军事乃至经济文化之中心，从而为清军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。沈阳故宫在清王朝迁都北京后的260年间，一直受到清王朝的尊崇，被称为“京宫阙”、“陪都宫殿”。清制，历朝皇帝登基后，均须东巡陪都，祭奠祖宗。乾隆朝，高宗弘历多次东巡谒陵，对先皇宫室深怀尊崇，并规定此后凡内府刻印之书，每种均以一部或数部，送至盛京故宫收藏，其用意一是供皇帝前来祭祀时使用，二是借此提高盛京故宫的地位，以示其不忘根本，敬重祖宗之意。因此，乾隆年间完成的文化巨著《四库全书》缮写本，亦送往沈阳故宫一部，存放于专门为之建筑的藏书楼“文溯阁”中。

### 一、文溯阁之建制

今日尚存之沈阳故宫文溯阁，乃为贮藏《四库全书》而专门兴建。《四库全书》自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编纂始，至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“南三阁”本缮竣止，历时十五年之久。《四库全书》编成后共缮写七部，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的文渊阁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、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（以

上称北四阁，又称内廷四阁）、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、杭州文澜阁（以上称南三阁），而底本存放于北京翰林院。“内廷四阁”之兴建，文渊、文源、文津三阁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前后即已陆续完成，惟盛京文溯阁至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始正式动工，动工虽晚，速度却很快，当年兴建，当年即完工。

文溯阁位于今沈阳故宫西路，与《四库》其余六阁相同，均仿宁波范氏“天一阁”之制。檐前悬有御书汉文“文溯阁”匾额，殿内悬有高宗御书楹联，文曰：“古今并入含茹，万象沧溟探大本；礼乐仰承基绪，三江天汉导洪澜。”其外观为二层建筑，黑琉璃瓦绿剪边硬山顶，面阔五间（加西侧楼梯间为六间）。阁之下层，前后均出檐廊。额枋绘以“河马负图”、“翰墨册卷”等苏式彩画图案，画面以蓝、绿、白等冷色调为主，与绿色立柱相配，给人以清爽之感。前檐两山各有卷门，其上悬砌绿琉璃垂花门罩，门下各有四级踏跺。阁内实为三层，下层顶板下的空间，东、北、西三面各以回廊的形式增加一层，俗称“仙楼”，两侧各占一间之地，正面者约二米多宽，使正中三间形成二层空间的敞厅，下层靠北以隔扇分出近二米宽的过道。敞厅内置有御榻、书案、香几、鸾翎宫扇等，其东、西间及隔扇后夹道，也分别置有紫檀炕案、琴桌、挂屏等，仙楼及顶楼上亦于书架间置有宝座、桌、杌、香几等，供皇帝驾临时使用。阁内各层，则分列《四库全书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书架。阁前为一宽阔月台，台前为三间黄琉璃瓦卷棚式宫门，阁后东西两侧各有回廊，呈九十度，与阁之两山墙相接，自成院落（原为芍药园）。

文溯阁之东，建有黄琉璃瓦顶碑亭一座，四角为曲尺形红墙，其间围以栏杆。亭内置石碑一座，碑阳为高宗御制《文溯阁记》，碑阴为御制《宋孝宗论》，均用满汉两体文字书刻。《文溯阁记》为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八月至九月高宗东巡盛京时所撰。此记叙述编纂《四库全书》主旨，又道出“内廷四阁”命名之用意：“四

阁之名，皆冠以‘文’；而若渊，若源，若津，若溯，皆从‘水’以立义者，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，亦既见于前记矣。若夫海，源也，众水各有源而同归于海，似海为其尾，而非源不知尾间何洩，则仍运而为源。原始反终，大《易》所以示其端也。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，是则溯也，津也，实亦迨源之渊也。水之体用如是，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？恰于盛京而名此名，更有合周《诗》所谓‘溯涧求本’之义，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，示子孙守文之模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”<sup>①</sup>

## 二、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之入藏

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，四库馆总校官陆费墀、将军永玮奉命专程赴盛京文溯阁陈设《四库全书》等书籍，并于文溯阁东侧立《御制文溯阁记》碑，此为文溯阁正式藏书之始。

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为四库馆缮写的第二份，缮成时间，当于乾隆四十八年春。据盛京内务府档案记载，乾隆四十七年九月，第二份《四库全书》尚未钞完，已开始考虑运送事宜。因北京至盛京路途遥远，为使书册运送过程中不遭损坏又确保安全，议定按地域划界，分别负责：自北京至山海关一段，由直隶总督负责；自山海关至盛京一段，则由盛京将军及奉天府尹负责。

盛京故宫藏《四库全书》等书分五批运抵：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运到第一批，系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（因七阁建成在前，《四库全书》修成在后，为了不使阁楼空置，乾隆皇帝曾各颁文渊、文源、文津三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，而文溯阁则是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《四库全书》同时入阁）和《四库全书》；一月之后，运抵第二批《四库全书》；翌年正月二十五日，运抵第三批《四库全书》；二月二十七日运到第四批，三月二十日运到第五批，另有空书匣三百六十四。同年九月初，又由京送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二十函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三函、《四库全书考证》十二

函<sup>②</sup>。至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弘历东巡盛京之前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当已全数送抵并于阁内安放整齐，以便其入阁御览。

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分贮于阁内三层。阁之下层陈放《四库全书》经部二十架（每架四格）九百六十函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十二架五百七十六函（五千零二十册），《四库全书》之《总目》、《考证》和《简明目录》共三十五函亦置于此；阁之中层（仙楼）陈放《四库全书》史部三十三架（每架四格），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函；阁之顶层陈放《四库全书》子部二十二架（每架六格）一千五百八十四函、集部二十八架（每架六格）共二千零一十六函，共六千一百四十四函。所置书架，因均刻有“《四库全书》×部第×架”或“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第×架”字样，如欲查找某书，只需根据事先编好的分架图，便可检索到该书所在位置。

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系内府写本，装潢书写，均甚精美，书函外配以特制的楠木书匣。书册为软面包背装，其封面选料，经部用绿绢，史部用红绢，子部用青绢，集部用灰绢，以四种颜色代表春夏秋冬四季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四库全书考证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则以黄绢为封面。书页框界皆为朱色，四周双边，半叶八行，行二十一字。版心上栏题“钦定四库全书”，中为书名。各书卷首，均冠以提要。册之首尾二页，均钤有“文溯阁宝”和“乾隆御览之宝”玺印。全书所用均为洁白坚韧之开化榜纸，工楷书写，字体娟秀，墨色古雅，展卷令人心旷神怡。

为加强对文溯阁的管理，乾隆四十八年经盛京内务府奏准，特增设管理文溯阁事务专职人员，掌管《四库全书》之藏。每年的四月份咨行盛京工部，领取樟脑六十六斤、鸡毛掸十六把。为防潮去湿，保护藏书，规定每年六月将文溯阁藏书晾晒一次，又隔年重糊一次门窗纸。

### 三、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之覆校

《四库全书》缮写完毕，分别入藏七阁后，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覆校工作。在“内廷四阁”中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的覆校均在最后。

一、乾隆五十二（1787）年五月，乾隆皇帝驻蹕热河期间，翻阅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发现其中讹谬甚多，遂命将“内廷四阁”《四库全书》重行校阅，并将看出疏漏之原校官罚往奉天重校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乾隆五十五（1790）年三月，原任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陆锡熊遵照乾隆谕旨，带领原校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疏漏之总校和分校“刘权之、关槐、潘曾起等前赴盛京，详校文溯阁《全书》”<sup>③</sup>。由于文溯阁藏书远在盛京，查校底本颇多不便，因此，陆锡熊将部分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之底本直接带至盛京，并指定原派往盛京的校书人员中一人留京专办底本，凡“有应需查对者，即陆续移取，雇人赍送盛京应用”<sup>④</sup>。校勘文溯阁书籍各员抵达盛京后，即开始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的第一次校对。由陆锡熊“总司核签，仍兼分阅，与详校之刘权之、郑际唐、关槐、潘曾起、翁方纲等，每人应分一千余函，谨将各书逐段均派，按股陶分，以专责成而均功力”<sup>⑤</sup>。在覆校过程中，当地官员对书籍管理十分严格，校勘人员所校阅书籍，由盛京将军指派专人“查照总裁官开列书名图记清单，赴阁照单查出书籍，登记册档，用黄盘连匣盛贮妥协，派官敬谨押役抬交收发所查收。校毕发回时，仍令照前敬谨押回”，查对明确后再“归架销档”，盛京将军亦不时“亲往查察，以昭慎重”<sup>⑥</sup>。这样，历经四月之久，至乾隆五十五年七月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的覆校工作全部结束。“计阅过书六千一百余函，此内点画讹误，随阅随改外，查出誊写错落、字句偏谬书六十三部，漏写书二部，错写书三部，脱误及应删处太多应行另缮书三部，匣面错刻、漏刻者共五十七

部”<sup>⑦</sup>。

二、乾隆五十六年七月，乾隆再次偶阅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发现“扬子《法言》一书其卷一首篇有空白二行。因检查是书次卷核对，竟系将晋唐及宋人注释名氏脱写。书中篇首空至两行，显而易见，开卷即可了然，乃详校官既漫不经心。”此事使乾隆十分气愤，遂下令将“纪昀及详校官庄通敏俱著交部分别议处”，并“著纪昀亲赴文渊、文源二阁，将扬子《法言》一书检出，缮录御制文冠于简端，并带同详校官抽查此书卷首是否亦有空白之处，乃此外各书有似此脱误者，一体抽阅填改”<sup>⑧</sup>。由此，引发“内廷四阁”《四库全书》的再次覆校。

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至年底，纪昀带人先后对文源、文渊二阁《四库全书》进行第二次覆校，结果又查出不少问题。当时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初次覆校查出的“应行抽改驳换者查明改正，其留空函书，彼时俱亦归架”，军机处议决，借初次覆校时留京专办底本的张焘往盛京送书之机，派其先行人阁抽阅《四库全书》，“若讹阙较多，断非一人所能办理，即令呈明军机处，请旨仍令陆锡熊及前此同往看书各员前赴盛京，复加详阅”<sup>⑨</sup>。陆锡熊等人看到文源、文渊二阁《四库全书》再次覆校所查出的种种问题，不由得担心所经手校阅的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亦难免有错，故未等张焘回报，便由陆锡熊主动上奏：“兹查文源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经纪昀等覆核，中间缺落、舛伪尚多，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现在阅竣，亦未免尚有沿讹。是《四库全书》卷帙繁富，屡校即屡有改正，雠刊实不厌精详。所有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亦应一体复加详核，俾得益增完善。一交新春后，臣即起程赴盛京，多带看书熟手，详加覆阅”<sup>⑩</sup>。参加了初次覆校的礼部右侍郎刘权之，亦表示“思去年所校文溯阁书，诚恐校手、写手、补匠或有疏漏，臣一时心力、目力稽查未周，实难保必无舛误”，“今情愿自备资斧，另行倩觅校书熟手，率同前赴文溯阁复加详核，并钞录纪昀此次

所奏二阁清单，逐细查检，断不敢稍有回护。”<sup>①</sup>

乾隆五十七年正月，陆锡熊等人由北京出发前往盛京。一路冰雪载途，因“山海关道中冰雪冻沍，比至奉天”，陆锡熊即“以病寒卒”<sup>②</sup>，遂由同行的礼部侍郎刘权之接替其职，开始了对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的第二次覆校。刘权之将原应由陆锡熊校阅的1000余函，与各详校摊匀分阅，责成各详校认真覆核，并“每人各付一册档，填写姓名。其签改之处，并令详载各书卷数及某页某行，以便按籍抽核”，同时对照文源、文渊二阁的核阅清单，“随时核对缮补”<sup>③</sup>。奉天府丞亦表示，对校勘人员“交出各书，归架时逐函抽看，如查出缺误，即拨回令其另校，务其详慎无误”<sup>④</sup>。然而，尽管刘权之再三督责，地方官谨慎查办，但总纂陆锡熊的猝然病逝，使校勘者情绪受到影响，给覆校工作带来不利。大致经过两月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的再次覆校即草草告竣。

此次覆校工作结束后，盛京地方官员将“所有校出各书，逐卷详查，依次敬谨归架”。其中《性理大全书》一种，交由刘权之带回另缮。同时，初校时“撤回改缮各书，内除《南巡盛典》、《八旗通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三种改缮未经送到外，其余撤回各书俱已发来，照存记原档查点无误，一并归架”<sup>⑤</sup>。

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虽然经过两次覆校，仍然存有错谬之处。不过，经此两次覆校，毕竟查出了许多讹谬，对于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的质量，还是产生积极的作用。

#### 四、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之命运

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自入藏盛京以迄于今，与目前同存于世的其他三阁《四库全书》一样，也经历了坎坷的命运。

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沙俄帝国侵占东北三省，动乱之中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曾出现散失。入民国，1914年，段芝贵任

奉天督军期间，下令将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运往北京。其书抵京后藏于故宫保和殿，一去十年。1925年，东北筹办奉天图书馆。奉天教育会会长冯广民等力谋将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运回，奔走于北平、天津，获得张学良将军等支援。后经当时内阁会议同意，1925年8月将《四库全书》运回沈阳文溯阁。此事原委，辽宁省教育会1931年6月撰有《文溯阁运复记》，并立碑于文溯阁东侧，以昭示后人。同时成立阁书保管委员会，专司保管之责，并推选李象庚负责修葺文溯阁，以改善收藏条件。经清点，查出《四库全书》缺书十六种、七十二卷<sup>⑩</sup>。1926年，由董众、谭俊山负责，觅雇钞手二十余人，至京传钞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至1927年完成。钞补之书，其中有数种重复，如现存辽宁省图书馆的补钞本《西河集》、《礼书纲目》残卷，即为钞重之本。

1928年秋，由张学良、杨宇霆等发起，经金梁、伦明等策划，东北地方政府提出影印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计划，拟议以五年为期，影印阁书2000部。通报全国，先期征订，海内外预购者纷纷。后因技术力量不足，如照相材料、印刷机器以及用纸等问题无从解决，未能即刻付诸实施。未久，发生杨宇霆被杀事件，政局动荡，影印计划遂中止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落入了日本侵略者手中。当时的（伪满）国立奉天图书馆，曾于1934年又据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补钞了《礼书纲目》、《翻译五经四书》、《挥麈录》三种十二册。至此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始得完整。由于文溯阁年久失修，出现了渗漏现象。1935年在文溯阁院内西南部新建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楼书库，称为新阁，门窗悉包以铁叶，库内安装钢铁书架，以期坚固。外部则飞阁雕墙，仍仿旧制。1937年6月新阁竣工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及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全部移入，原有书架仍留文溯阁中。新阁藏书，库位不变，书架统一改为四格，故子部原六格二十二架改为四格三十三架，集



部原六格二十八架改为四格四十二架。

抗日战争结束，1946年4月，当时的东北教育接收辅导委员会委员命金毓黼、周之风等人接收（伪满）国立奉天图书馆，改称沈阳图书馆（后又改称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）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同时接管。同年8月，对《四库全书》进行清点，费时三月始竣。据当时清点记录：“计上层子部1584函，9071册；集部2016函，12265册；下层史部1584函，9408册；函数为6144函（内有简明目录3函），册数36253册。”<sup>⑩</sup>至1949年，东北图书馆（现辽宁省图书馆）接收了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全部藏书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仍存放于新阁。同年6月，再次组织人手清点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清点册数为36315册。

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，以策万全，经有关部门决定，于同年10月，东北图书馆将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运送至黑龙江省讷河县，收藏在城外的一个小学校中。同时运抵的还有崇谟阁汉文、满文实录、圣训、玉牒、宋元刻本等珍善图书。第二年，因防备水灾，又将上述图书从讷河县转移至黑龙江省北安县。三年半以后，抗美援朝结束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于1954年1月重新运回沈阳，仍旧收藏在文溯阁旁的新阁中。

辽宁省图书馆接收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以来，十分重视保护工作。一直派有专人保管，先后有牟文元、夏筠德等同志负责。每年春夏之月，开窗通风，调节阁内温湿度。每两年于库房投放一次樟脑药，避免生虫。在《四库全书》疏散期间，还有驻军保卫。

1965年，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，又准备将馆藏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与其余善本图书一同疏散。在装箱过程中，发现部分图书出现水渍、破损等情况，1965年6月，本馆曾组织二十余人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分组逐册、逐页对《四库全书》进行彻底清查。对书中出现斑点、污染、虫蛀、水渍、长毛、破损、以及函

匣破损等情况，都详细做了记录，汇成十五册，订为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检查纪要》（现随《四库全书》收藏在甘肃省馆）。清点结束后，写成总结报告一份上报。清点期间，省委书记李荒同志曾亲自至文溯阁查看情形，并批示：“《四库全书》里有的书受潮湿，霉烂的，要进行修补，人力缺时，可把博物馆等单位裱糊工人都集中起来，突击一下，趁这个机会修补好。”为此，立即组织修补组，由四位技术工人（辽宁省图书馆雷宗元同志，省博物馆一人、画报社二人）用了近半年时间，集中对一百余册《四库全书》进行了彻底修补，重新装裱。

1966年，根据中央文化部办公厅1966年3月7日“文厅图字24号”公函指示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拨交甘肃省图书馆收藏。甘肃省馆派员来沈阳，于1966年9月13日至10月14日详细办理了交接手续。当时清点结果，“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共有6141函，3474种，36315册。另有《简明目录》、《总目》、《考证》、《分架图》共4种39函265册，以及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，共576函，5020册”<sup>⑧</sup>。交接完毕后，由辽宁省馆二人、甘肃省馆四人押车，将上述图书运往甘肃省图书馆，收藏于兰州郊外一个山坳的书库中，至今保管完好。

## 五、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之研究

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之研究工作，始于民国时期东北著名学者金毓黻先生。

1933年，金毓黻先生任（伪满）国立奉天图书馆副馆长时，开始着手对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的研究。金先生发现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提要与纪昀所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（下简称《总目》），无论从内容、次序上，还是从各书书名、著者、卷数上看，均存在很多不同之处。遂将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提要钞录下来，与《总目》进行比较和研究，并依据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之次序，

编成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一书，1935年由辽沈书社铅印出版发行。据金先生以表格形式所胪列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提要与《总目》之异同，仅书名，著者、卷数等项，即有661种书存在差别。至于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提要与《总目》之内容异同，金先生指出：“原本提要与现行《总目》相对，无有一篇无异同者。其通篇不同，各类皆有。”由于现存各阁《四库全书》提要，未有如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已经单独辑出者，而此书对于“四库学”研究具有一定价值，1999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已再次影印《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（附有书名和著者索引），受到研究者欢迎。

此外，1938年4月，（伪满）国立奉天图书馆曾编辑出版《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》一书。该书虽属简目，未作深入研究，但较准确地记载了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之源流、补钞、缺佚、抽毁等情况，为研究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不可缺少的记录。

近年来，“四库学”研究成果出现不少，但对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作系统研究者尚不多。如有关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之收书种数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。多数学者认为，现存三阁半《四库全书》中，文溯阁本为收书种数最多的一部，但究竟收书多少种，没有确切说法。为此，现对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收书的确切数字，稍加考证。乾隆以后有关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收书种数的记录，尚未见及，现将民国以来的有关记录，钞录如下：

一、1935年，金毓黻辑录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，收入提要3470种。据查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中有三种书（《南巡盛典》、《八旗通志初集》、《性理大全书》）缺提要，又有一种（《日讲诗经解义》）为有函无书<sup>⑨</sup>。金先生所辑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提要为3470种，加上无提要四种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收书应是3474种。

二、1938年，（伪满）国立奉天图书馆所编《文溯阁四库全书

要略及索引》一书，记载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收书为 3590 种、36221 册。

三、1946 年，国立沈阳图书馆所编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概况》（稿本），记载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收书为 3590 种，36236 册。

四、周之风所撰《沈阳博图两馆接收记》中，记载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为 3590 种，36313 册。<sup>②</sup>

五、1949 年，东北图书馆接收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之清点簿，记载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为 36315 册。

六、1966 年，辽宁省图书馆为向甘肃省图书馆移交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所作清点记录为 3474 种，36315 册。

七、1989 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据甘肃省图书馆著录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总数 3590 种<sup>③</sup>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收书种数 3474 种，应该是准确数字。一些文章中所言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收书 3590 种，并认为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收书所以多于其他各阁，是因为远离京城，一些应该抽毁的图书未经抽出，其实则不然。乾隆五十二年开始连续发生的抽毁删改图书，总计有十一种，查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中被抽毁之书，与乾隆五十二年奉旨销毁的十一种书正相吻合。而且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收之书，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亦缺有 13 部<sup>④</sup>。不过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确实较存世的三部《四库全书》收书多出数种：较台湾故宫所藏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所收 3460 种（据影印本统计）多 14 种；较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所收 3470 种<sup>⑤</sup>多 4 种；较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所收 3450 种<sup>⑥</sup>多 24 种。因此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实属现存各本《四库全书》中收书最多的一部。

参考书目：

①弘历撰：《文溯阁记》，《御制文二集》。北京，清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武英殿刻本卷十四，4页。

②乾隆四十八年京行档：《黑图档》，清盛京内府档案。

③④⑤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副都御史陆锡熊奏折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2173页。

⑥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盛京将军嵩椿奏折，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2172页。

⑦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副都御史陆锡熊奏折，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2190页。

⑧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八日谕，国立北平图书馆编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》。北京，国立北平图书馆，1934，33页。

⑨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军机大臣奏折，国立北平图书馆编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》。北京，国立北平图书馆，1934，35页。

⑩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副都御史陆锡熊奏折，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2276页。

⑪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礼部右侍郎刘权之奏折，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2278页。

⑫任松如撰：《四库全书问答》。成都，巴蜀书社，1988，16页。

⑬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礼部右侍郎刘权之奏折，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2293页。

⑭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奉天府丞福保奏折，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2294页。

⑮乾隆五十七年部来档：《黑图档》，清盛京内府档案。

⑯所缺之书为：《礼书纲目》十卷、《春秋列国世纪编》一卷、《春秋集传详说》八卷、《翻译五经四书》七卷、《瑟谱》六卷、《韶舞九成乐补》一卷、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十二卷、《盛京通志》四卷、《谥法》四卷、《证治准绳》一卷、《高斋漫录》一卷、《鲸背集》一卷、《西河集》九卷、《御制诗集》二卷、《玉澜集》一卷、《雁门集》四卷。

（下转第143页）

《补闲词》二卷，他的两个哥哥朱依程（春岑）、朱依韩（秋岑）也都有诗名，朱依程有《耐寒词》二卷，朱依韩有《秋岑诗草》。朱依真诗词之外又作有词曲剧本，李秉礼为其所著《九芝堂诗存》作序说：“小岑著作甚富，兼工词曲，其《纪年词》及《分绿窗》、《人间世》杂剧皆可传身后。”（见《九芝草堂诗存·序》，道光二年刻本，桂林图书馆藏本）《清诗纪事》载林昌彝《海天琴思续录》云：“荃兰哀怨谱孤弦，牛耳齐盟孰比肩。莫听凄凉江醴曲，千秋魂断柳屯田。”下注“小岑工填词，有《人间世传奇》、《分绿窗杂剧》，其《吊柳》一剧，最为凄绝。”从以上二则记载可知，朱依真著有《人间世传奇》和《分绿窗杂剧》。《吊柳》是柳永故事剧，应是其中最为凄绝之作，估计是《分绿窗杂剧》中的一种。惜剧本未见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

（上接第 159 页）

①⑦ 沈阳国立图书馆编：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概况》。沈阳，沈阳国立图书馆，1946。

①⑧ “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交接书”，辽宁省图书馆藏档案。1966年9月29日。

①⑨②②（伪满）国立奉天图书馆编：《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与索引》。国立奉天图书馆，1938，29页、27页。

②⑩ 周之风：《沈阳博图两馆接收记》，《辽宁文史资料精粹》第五卷。沈阳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9，640页。

②⑪②④ 中国古籍善本书编辑委员会：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丛部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，第395页。

②③ 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曾深入调查研究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经仔细校核后作有札记，认为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收书3470种（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所收书3503种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辽宁省图书馆